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

大自然的声色、形态、动静、趣味和氛围，

与艺术家的五官

感觉有着一种神秘的协调，

各种要素在艺术家的心里造成一种表象积累，

逐渐由一列表象抽象上升为一种“完形”，

于是艺术家的心理自然而然便具有了一种定式图式。

当他审美创造时，

他便会下意识地按照这套图式去发现、构思和表达，

于是他的艺术风格

便与地理环境的特征风格有了相似之处。

中国书法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

吴慧平 / 著

荣宝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 / 吴慧平著.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9. 9

(中国书法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003-1142-3

I. 书... II. 吴... III. 汉字—书法—文化地理学—研究
IV. 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150号

丛书策划: 张建平 崔 伟

责任编辑: 刘 芳

审 读: 江金照

特约编辑: 王小飞

装帧设计: 安鸿艳 王 玺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书法文化地理研究 吴慧平 / 著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735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制 版: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2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5003-1142-3 定价: 38.00元

序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名家辈出，珍品累累，蜚声艺坛。而书法的科学研究近年也相继勃兴，或探讨书法家艺术生涯，或考证书法作品真伪，或梳理书法艺术源流，寻找其历史发展规律，以及书法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等，可谓蔚为大观，成为当今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股潮流，彰显了书法艺术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区域差异很大，这对书法家的艺术感应和效果显然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奠定了我国书法艺术南北分流的地理基础。对于书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也代有其人，发端赵宋的欧阳修、赵孟坚，继为朱明董其昌，到清代阮元，以及近代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有不少独到见解，彪炳于书法艺术史。特别是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从宏观上开启了我国书法文化景观研究的先河，而梁启超从中国地理大势差异的视野，在接受和推介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上，指出我国书法南北之别的根源在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同：“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本，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关系。”这可算是从文化地理角度审视书法艺术之嚆矢。及至现代，书法研究已随着人文地理学在我国复兴而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一批很有地理分量的作品，昭示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书法文化地理学正走向蓬勃发展时期，其

美好前景当可预期。

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吴慧平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部专著，对书法文化地理的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及其作用和影响等，提供了值得重视的一例。

首先，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书法文化地理的作品。它发端于书法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继而论及作为文化景观的书法载体汉字所蕴涵的物质、制度、精神等文化内涵，以及这些景观的历史时空发展、差异和传播，最后归结于书法地理分区，从而提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书法地理的一系列纵横剖面，及其文化生态学动因。这一研究框架、体例、内容和布局，完全符合文化地理学要求，也圆满地达到该项研究的目的。

其次，在我国书法文化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时期，一方面造成人口大流动，带来文化大交流，有利于南北书法艺术融合；另一方面，割据局面又使地域文化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两个并存过程及其互动，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书法艺术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书法艺术历史和地理风貌分布上占有重要地位。选择这个断代作为研究对象，可谓深得要领，既能承前，又可启后，对我国方兴未艾的书法文化地理学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区域既是地理研究的起点，也是地理研究的高峰，一切研究成果，应综合于区域，归结于区域，故区域地理在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近年，因为部门地理发展兴旺，区域地理却相对萎缩，在一些地区有关院校中甚至被取消，前景堪忧。可喜的是，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在论述书法文化南北交流传播之同时，又以足够篇幅划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地理区，揭示各自书法文化特质和风格，钩沉、总结出书法文化地域分异的规律。这不仅标志着该项研究达到自己的巅峰，而且为同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此外，书法文化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风格和魅力的，作者深谙此道。在这部专著中，插入不少名作书法、真迹，含各种字体的摩崖石刻、碑、帖、画等，这不仅是一种论述形式，也是一种艺术欣赏，也是值得称道的。

还有，这部专著实际上也是作者多年实地考察我国山川形胜、风土人情积累的书法文化成果。在这个地理考察荆棘丛中，作者滴下了许多诚实的汗珠，故写出来的文字，有骨有肉，充满了真实感，结论也令人信服。它表明，野外调查即使在科学昌明、信息技术发达，特别是网络覆盖天下的今天，仍是地理研究和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它没有也不可能被取代。相信一个真正的地理学者、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恪守这样的一条治学成功之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中山大学的人文地理专业提前半年毕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且颇多好评。这在中山大学研究生中也是不多见的。答辩后，作者不断修正、补充，使论文日臻完善，延至今日出版，这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我作为论文写作的指导教师，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敬请读者见谅。

是为序。

司徒尚纪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2009年3月22日

目 录

序 / 司徒尚纪 / 1

第一章 绪 论 _____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相关研究进展 / 1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13

第三节 课题意义及创新 / 16

第四节 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 18

第二章 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书法 _____ 23

第一节 地理环境——文化创造的基石 / 23

第二节 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 / 26

第三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象形文字 / 31

第四节 书写材料与地理环境 / 41

第五节 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 / 48

第六节 书法的精神世界与地理环境 / 58

第三章 书法与书法文化^[1] _____ 64

第一节 书法的文化结构 / 64

第二节 书法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 67

第四章 书法文化景观 _____ 82

第一节 景观与文化景观 / 82

第二节 书法文化景观 / 88

第三节 书法文化景观的分类 / 97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景观 /107

第五章 书法文化的传播 _____ 147

第一节 书法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学概述 /147

第二节 书法文化的传播 /15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传播模式研究 /162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南北交流 /174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景观的整合 /184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书法文化交流 /187

第六章 书法文化区的划分 _____ 197

第一节 文化区及其划分标准 /197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的区域分析 /20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区的划分^[12] /211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区简介 /216

第七章 书法与文化生态 _____ 239

第一节 书法文化背景下的生态学概述 /239

第二节 书法文化生态概述 /24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生态略论 /255

结 语 _____ 293

附 录 _____ 297

一、魏晋南北朝书法家籍贯一览表 /297

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籍贯分布表 /318

参考文献 _____ 331

后 记 _____ 34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相关研究进展

一、选题背景

在我的家族里，我的伯父、父亲都喜欢写字，逢年过节，都有人找上门来求字，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培养了我对书法这门艺术的浓厚感情与持续兴趣，对书法的热情与日俱增，一直保持至今。当然这种兴趣仅仅停留在涂鸦阶段，还谈不上对书法有多么深刻的认识。1988年初中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很好的常德师范学校，有幸结识了常德书法家协会主席陈国安先生，书法才算正式入门，以后便一直没有间断过对书法的研习。当时对书法的认识，还比较简单，仅仅停留在如何把字写得漂亮。如果有人夸奖我的字写得好，我便会偷偷的乐上一整天。三年的中师生活，记忆最深的还是练习书法的苦与乐，也正是这种书法方面的特长，使得我有机会被保送到湖南师大地理系继续深造。在我记忆的深处，大学四年我于地理的学习还算得上认真，尤其是人文地理方面。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法，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现在想来，进入地理系乃是上天赐于我的一种缘分。四年级时，毕业论文的选题真让我费了不少脑筋，说实话，我对于地理学中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不是很感兴趣，因此不想做这一方面的论文。那时我正准备考首都师范大学的书法研究生，于是便有了书法与地理的选题。书法与地理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关系多大，是我那时经常思考的问题。1996年我的学位论文《略论地理环境与中国书法》

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接着被连续转载，这一下子激励了我继续研究的兴趣。在以后的教师生涯中，我相继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论文，这些基础对我以后的研究方向——书法文化地理影响甚大。为了进一步加深对书法的了解，1998年我进入梦寐以求的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攻读书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当今著名的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张同印等先生，学习书法文化，从地理专业逐渐转向为书法专业。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使我对中国的书法有了进一步了解，也增强了我对书法文化地理研究的信心。书法是一门艺术，但终归是一种文化，文化与地理之间不可否认的关系决定了书法与地理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的研究成为当时我最感兴趣也最关心的问题，稍有发现我都会欣喜若狂。为了更深层次的研究，2001年我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随中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先生学习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这为我今后所进行的书法文化地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的基础，再从这一角度对我熟悉的书法文化进行研究，我可能比别人多了一些优势。这是我以书法文化地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的基本理由。

从现今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术的研究具有越来越深入的趋势。一方面许多学科在逐步分化，愈来愈在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各门学科互相渗透、彼此交叉、趋于综合发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交叉学科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重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均是建立在学科交叉基础之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的转换，方法的变更，往往能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把书法与文化地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便符合当今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的趋势。朱谦之先生对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的内在关系有这样的论述：“同一对象可以成为科学，也可以成为哲学，乃至艺术，成为宗教；然其所以成为不同知识的原因，则完全属于方法问题。皮尔松说得好：‘科学的本体，在他所用的方法，不管所取的材料是哪一个。’”^[1]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

“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2]书法文化地理属于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书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涉及到了历史学、艺术学、景观学、考古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属于典型的边缘交叉学科，也和当前学科发展的趋势一致。预期研究成果的取得，将把书法学、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推向更深的层面。

建国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保持着经济地理一支独秀的局面。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自从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及其学生对文化地理及文化区域进行定量研究以来，地理学者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便开始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李旭旦教授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后，这门学科才得以迅速发展。至90年代，是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时期，从介绍国外文化地理的研究状况、翻译相关的研究成果开始，如王恩涌先生翻译的T. G. 乔丹和罗文垂的《文化地理学》(北京大学地理系铅印，1986年)、王民先生等译的H. J. 德伯里的《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逐渐将文化地理的理论及方法应用到我国文化研究之中。国内一批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开始关注我国文化地理的发展，并对文化的地区差异、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划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3]；还有的对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历史及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回顾与探索^[4]；也有的对部门文化地理如方言、地名、音乐、建筑等开展了深入扎实的工作，如周振鹤、游汝杰先生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正祥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对台湾的地名—文化层分期的研究。此后又有赵世瑜、周尚意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卢云先生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会昌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步天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司徒

尚纪先生的《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侯仁之先生的《黄河文化》(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张伟然先生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夏曰云、张二勋先生的《文化地理学》(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胡兆亮等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尚意、孔翔、朱竑等先生的《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一系列文化地理专著的相继问世,加上大量研究论文的发表,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文化地理学,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稚嫩步入成熟阶段。这些通论性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分析了文化地理的诸多命题,并做出了有各自特色的贡献。尤其是周尚意先生的《文化地理学》增加了实质性的、细致入微的案例分折,这对书法与文化地理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

关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定义,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的一门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它关注的是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其研究的是文化差异和人地关系。当然,由于其丰富的内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地理所研究的不仅是现代文化地理这样一个很薄的层面,还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的各个层次。

一些学者还强调文化源地的研究。而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除了人文地理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区位论、行为理论之外,已有学者在逐步尝试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迁移理论、文化扩散理论、文化融合理论等引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另有学者将民俗学、民族学等的理论引进部门文化地理。但真正构筑起较完整的文化地理系统理论框架、较全面阐述现代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手段,并按部门较详尽论述其内容,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实际的、真正意义上第一部经典的现代文化地理著作是北京大学王恩涌先生的《文化地理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的推出,不仅构建起了我国文化地理研究理论大厦的框架,而且使我国文化地理学教学与研究有了范本可循,尤其是作者用文化地理学的思想

与方法对有关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探讨,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明了方向。其认为,文化地理学的主要内容通常被认为包括五个方面,即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扩散和传播、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文化区^[5]。而周尚意等先生的《文化地理学》以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结构框架,辅以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分别介绍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轨迹、文化生态、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的区域性、文化产品开发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特别重视、强调中国的个案研究。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无疑推动了艺术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艺术文化地理属于精神文化地理研究的范畴,概而论之,戏曲、音乐、文学、绘画、书法等都可以称之为艺术。艺术文化地理既是一个地理艺术概念,本质上又是一个文化时空范畴和人格美学理念^[6]。单鹏飞等人早在1991年就对地理环境对于建筑、绘画、文学等的艺术风格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了各地不同的建筑、绘画、文学的艺术风格特点^[7]。霍诗雅、肖玲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艺术地理的相关研究,分别对文学地理、戏曲地理、音乐地理、美术地理,以及书法地理五个研究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和研究^[8]。今概要如下:

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在艺术地理学中为研究最早、研究范围最广的,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学的组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地域文学表现出的地域特征和差异。其内容涉及文学家的籍贯与地区差异、文学的地理分区、文学风格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中心的形成与传播等。如曾大兴、张卫东、莫立民、钱建状分别对中国历代文学家、唐代文学人才、南宋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作了梳理和研究,范军就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的表现、对创作者个性气质和审美心理的影响作了研究,并就对艺术创作灵感的诱发等展开了讨论。吕嘉健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利用美学的地理学和艺术的地理学的相似性进行概念的定义,并探讨了文学家笔下具有文化地理学意义的风景文学,总结出地理的

文化意境及文人如何表达意境的方法。王维国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文学中心的广泛流布以及形成的色彩迥然不同的文学区域。曹诗图从文学地理的角度阐明了中国文学的地区差异与地域特色,分析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并对文学与地理结合的“环境文学”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总结出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学及其地域差异之影响的三个方面。梅新林通过文学与地理的跨学科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体系。梁璐等通过对形成当代陕西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因素与人文地理因素进行研究,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方面,文学地理也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等技术转变。文学地理也为书法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戏曲地理:中国的戏曲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目前有据可考的有275种戏曲剧种,主要有京剧、昆曲、粤剧、川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和越剧八大剧种。还有湖南花鼓戏、东北二人转、彩调、皮影戏等300多个地方剧种^[9]。戏曲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和文学、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美术等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对戏曲地理的研究也包含了艺术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内容。但在地理学界对戏曲地理进行研究的人还不是很多。主要有胡兆量^[10]、吴述席^[11]、郑虹^[12]等人。

音乐地理: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可以看作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其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于民族音乐文化的地理分布状况,其在空间的传播及扩散规律等。具体内容涉及到音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音乐家的籍贯分布与区域分异之规律、民歌的地域性特征、音乐文化区、音乐地理学研究等内容。地理学界对其研究的学者很多,如乔建中^[13]、王耀华^[14]、张继昂^[15]、苗晶^[16]、廖明旗^[17]、蔡际洲^[18]等人。

美术地理:美术地理是研究美术这一门类艺术文化的地理形态及其

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对美术的地域性研究、美术地理学的综合研究等。主要研究者有刘海涛^[19]、郭建平^[20]、何鑫^[21]等。

二、书法地理相关研究及其进展

书法方面,近三十年来,随着构建书法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书法的研究开始升温。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进行的一场关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真伪的“兰亭论辩”把大量学者吸引进来。如郭沫若、高二适先生等,从而大大加强了书法研究人员队伍的素质,推动着中国书法的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标志着全面研究书法的时代到来。此后相继出版了一系列书法研究文集。1985年的《云峰山北朝刻石讨论文集》,1989年的山东临沂“首届王羲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王羲之研究》,1992年贾起家先生的《卫门书派研究文集》等。1992年陈方既先生的《中国书法精神》出版,他从人的生命存在这一独特角度对中国书法进行了系统研究。同一年,卢辅圣先生以另一新颖的视角出版了《书法生态论》,强调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对书法发展的影响,思辨性很强。1994年金学智先生出版了《中国书法美学》,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书法的“多质性”特征,以深厚的美学功底,从哲学、艺术社会学、创作美学、接受美学、形式美学、主体论美学、符号论美学等视角对中国书法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而细微的研究,在书法界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北京大学的金开诚、王岳川先生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从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的视角对书法进行探讨。同一时期,刘正成先生的《中国书法全集》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名家、二王卷的研究集中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有新的突破。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马钦忠先生的《书法与文化形态》一书,该书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书法的艺术性质。其一,从文化系统角度阐述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成因,辨析了中国书法的象征性意蕴,梳理了书法与汉字的内在联系,解

释了草书所体现的独特的文化隐喻作用。其二,从社会功能性这一点上描述了中国书法在社会流通即社会需要方面的特点。其三,探讨了书法艺术的空间性、时间性及音乐性。其四,从书法作品的内部构成解析了中国书法符号的特点及各种要素的关系。论点新颖,思辨独特。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书法史》,其中的《先秦·秦代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卷》《元明卷》《清代卷》于1999年以后陆续出版,标志着书法史断代研究的高潮到来。其中刘涛编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对魏、蜀、吴、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书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书法世家、书风的演变、书法收藏与鉴定等方面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资料翔实,观点突出。2002年首都师大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王元军先生的研究成果《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出版,其运用了大量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正史、杂史、类书、文集、笔记小说、僧道典籍,无所不包,尤其大量运用了最新的考古成果,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书法有关的社会风尚、宗教、士人阶层与平民社会、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以及书法发达地区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真正突破了以往研究书法主要关注于书家和作品的模式,是一本真正从文化学角度对书法进行研究的著作。近年,陈志平先生的《黄庭坚书学研究》、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祁小春先生《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研究》等专著的出版,不仅可以看作书法个案研究的深入,更可以看作是书法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取得成功的例证。政治学的背景使得白谦慎对于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书法艺术及书法家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这使得他对傅山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书法家个案研究简单化和模式化的缺陷,因而更加立体和丰富,对于其它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古典书学文献中,关于书法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仅有零星记载,但是关于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居民气质的影响很早就有论述。《礼记·中庸》里写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颜氏家训·音辞》中写道:“南方水土和柔,其

音清举而切谐，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涉及到地理环境与书法风格的著述在赵宋时代即有出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首先注意到了南朝书法的特点是纤劲清媚，缺少豪迈之气。他在《集古录》中云：“南朝诸帝笔法虽不同，大率意思不远，眇然都不复有豪气，但清婉若可佳耳。……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工书者率以纤劲清媚者为佳。”欧阳修仅仅看到了南朝书法的纤劲柔弱，缺乏北朝书法的豪气，没有进一步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到南宋时，有人看到了书法的南北差异，认为书法有南北之分。南宋赵孟坚云：“晋、宋之下，分而南北，有丁道护襄阳《启法寺》《兴国寺》二石，《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不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22]继明代董其昌的“画有南北宗”之说后，清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发挥了明代董其昌关于画有南北宗之说，认为“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23]，钱泳的《履园丛话·书学》中也说：“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24]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地理环境的差别对于书法风格的影响，提出了书法南北之分，但并没有深入。对中国地域的南北差异导致书法风格差异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当推清代朴学家阮元。对此，他写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他首先以当时南北书家的区域来区分南北书派，进而追溯南北书家的传承关系，以及南北书法景观的差异。

阮元《南北书派论》云：

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焉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有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